

后疫情时代： 一场全球化的道德实验 上

原来疫情是一场“关于全球化的道德实验”，我们是“抱着手机的道德家”，每天关注远方，却对身边的不幸无动于衷？还是爱心爆棚、满世界寻找救助对象，在弱者身上换取自我救赎？我们对他人不幸的态度里，隐藏着自身命运的密码。什么是基督徒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蔓延，中国情况好转，但全球抗疫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随着非洲确诊人数的增加，当地已经出现封城造成的贫民踩踏、警察开枪等失控征兆。因为卫生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疫情一旦在非洲爆发恐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在广州传来非洲裔人士被当作病毒传播隐患遭遇歧视的消息。而非洲华人已经感受到当地社会氛围的变化，对华人在非洲的生存处境发出预警。

我们原以为非洲的情况只是激起了我们对远方不幸的担心、忧虑和同情，但显然，我们已经与远方丝丝入扣地连在了一起。我们对他人不幸的态度里，隐藏着自身命运的密码。

就在疫情引发了许多人关注未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治理的变化，预判新一轮全球化的政经走向的时候，2020年初出版的德国知名作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汉宁·里德的新书《无处安放的同情》非常应景地提醒我们反思的另一个维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我们同样可以把本次疫情当作是一场“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考察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人不幸的。

全球化时代的道德进化？

现代媒体的发达，



几乎可以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拉近我们的眼前。在频率密集的报道甚至直播面前，人们越来越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远方的不幸。乐观的声音认为，人性就是“一条纽带，一头连着巴黎的市民，另一头连着北京的市民”，远离现场的人们被激起同情和怜悯，同时也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的道德感。悲观的意见却认为，人们开始会被一条消息、一张图片触动，但随着信息的轰炸，我们的同情心很快就疲劳了，下次必须一段惨不忍睹的视频才能激起我们的眼泪，我们对人的遭遇反而更麻木了。

里德在《无处安放的同情》里提醒人们思考，如何检视道德感的真实性。它能经得起考验吗？我们对远方的非洲人的怜悯和同情是真实可靠的吗？这种怜悯心是我们道德卓越的标志吗？

作者首先讨论了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刻画的著名形象“满大人”。巴尔扎克假想了一个情节，很像今天游戏里的场景：有一位远在中国的年迈的满大人，而一个巴黎人只要愿意仅凭意念就可以将他杀掉，获得财富。你是否会选择杀死他？“假想的满大人”是巴尔扎克对道德乐观主义的第一次诘问。

我们真的可以对远方的不幸感同身受吗？在头脑中给出一个答案很简单，但现实选择中的张力和冲突随处可见。近日沈阳一家粥店在门口挂出条幅对美国 and 日本的疫情幸灾乐祸，非洲华人对中国移民未来被排斥、可能接下来几年内都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前景忧心忡忡。上述情形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困境依然明显。当然，对中国这个全球化的受惠国而言，尽管今天我们打开手机未必能看到身边人、武汉人的不幸，但却能轻易将美国和意大利的悲情收入眼底，这种复杂的生存情景更让我们反思，如果以为热心观看远方的悲剧就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化，未免太轻率了。

巴尔扎克给小说中的人物安排的结局是，最终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利己的本性决定了我们对远人的关怀一定不如对自己的关怀更重要。在无关痛痒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为远人摇旗呐喊，一旦涉及个人得失，他人的不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抱着手机的道德家

我们的同情和共感之心是否能战胜距离的限

制？当疫情起于中国，恰逢《无处安放的同情》在中国出版，该书的译者、博士后研究员周雨霏说：“绝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这一肺部传染疾病（指新冠疫情）跟刚果埃博拉差不多遥远。虽然媒体上出现围绕着种族差别与反差别的争论，但对大多数欧洲居民来说，这一发生在中国某中部城市的人道主义灾难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像是处在两个次元。直到意大利的感染人数不断上涨，欧洲居民才开始感到疫情的真实性。”

在“满大人”的假想之后，亚当·斯密设想了一场发生在中国的地震，亿万中国人在地震中丧生，消息传到伦敦，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富有人性的欧洲人可能首先会对不幸的人感到悲伤，接着感慨于人生无常，“而一旦充分表达完所有这些高尚的情感，他就会同样悠闲和平静地从事他的生意和追求他的享受”，而“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对于这个伦敦人来说，失去一个小指的自怜远大于亿万人的不幸。

亚当·斯密提醒“富有人性”的我们，尽管我们可能并不属于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者，我们感

受到自己的怜悯之心，也向那些不人道的言论表达我们的义愤，但这一系列操作可能同时也是自我催眠，使我们自己在网络上所发表的高大上的言论等同于我们自己的所是，而实际上我们关心自己一根小指胜过“亿万人的不幸”。

而卢梭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捂着耳朵的哲学家”形象——“房间内，哲学家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幸福，或是普世道德的著作。正在这时，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被谋杀。他听到这个不幸的人悲惨的叫声，但在斟酌了一番之后决定对其充耳不闻，他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伦理的工作遭到打扰。哲学家思考整个人类之命运的工作如此重要，眼前所发生的不幸丝毫不能打动他。”

这个提醒已经很直白了。我们可能过着两面人的生活，一方面在网络上做道德斗士，另一方面对身边的不幸无动于衷。人们之所以爱远方的人，“为的是免去爱他们的邻居。”因此在批评完别人“不厚道”之后，我们可能也需要省察一下——自己是否是“抱着手机的道德家”？我们在朋友圈和微博刷屏，用转帖和键

